

張岳公閒話往事

張群口述
陳香梅筆記

張岳公閒話往事

張群口述
陳香梅筆記

張岳公閒話往事目錄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陳香梅	一
談談我的早年.....	張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五
談談我的婚姻.....	張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一一
談喝酒.....	張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一九
與日本結下了不解之緣.....	張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二三
任外交部長的回憶.....	張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四一
附 錄		
張岳軍先生傳略.....		八九
張岳軍先生訪日歸後述感.....		一一九

張岳軍先生自述對日往事

.....一三一

張岳軍先生論「敵友之辨」

.....一五九

張岳軍先生著「論修養」

.....一八一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今年二月底，我又因公事到東南亞，後來又到韓國，最後一站是臺北。每次到臺北總要去拜會張岳軍先生。最近一兩年來我曾再三要求他從事整理他的回憶錄。其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岳軍先生追隨 蔣公六十年，共赴革命，這段歷史至今還未有詳盡的紀錄，雖偶然有片段的報導，但都不免有些差誤，不免使讀者有隔靴搔癢之感。

第二、中國的近代史，尤其是從民國元年到撤退到寶島臺灣這段期間的大小事，其中當然有說不盡的可歌可泣事蹟，不要說中大學的年輕人只知皮毛，連我們在第二次大戰烽火中長大的一輩也不見得盡知其詳，只有在這段重要時代身歷其境的人才能把這段歷史交代清楚，所以這是岳公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三、近年來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許多自命中國專家的英美學人爲了迎合新

潮派運動，把中國的抗日抗共史實完全寫歪了，簡直面目全非。我們若再不來個爲歷史作證，百年之後可能發生臣寇不分，賓主顛倒的情勢。許多人或許已讀過前幾年由美親共女作家芭巴拉·塔思曼(Barbara Tuchman)所寫的「史迪威將軍與美國人在華經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 是中美聯合抗日期間，一九四二年由美派來中國擔任駐華美軍司令及聯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但他受左派人士包圍，一意孤行，也不與蔣公合作，後來被調返美國，因此懷恨在心，後來對日抗戰結束，抗共戰爭開始，他在美國多方爲共匪間接奔走，反對美政府助我抗共。因他與當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交深，從旁影響馬歇爾與杜魯門總統的政略。我國國軍在八年長期抗戰之後再要來應付有蘇聯作後盾的毛共，總不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這是我國一段非常慘痛的血淚史。) 因爲該女作者的文筆流利，該書一出，洛陽紙貴，大家爭相傳誦，我們知道內幕的人讀過之後，不但有點啼笑皆非之感，而且真有點憤慨，文人無行，含血噴人，於此爲極。自由的中國人再不寫有歷史價值的暢銷書，以後可能沒有爲歷史作辯證的機會了。(編者按：一九七一年梁敬錚教授所

著「史迪威事件」一書，在臺極為暢銷，對芭女士之書亦有所駁覆；其英文版「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1944: The Full Story」一年後由美國聖若望大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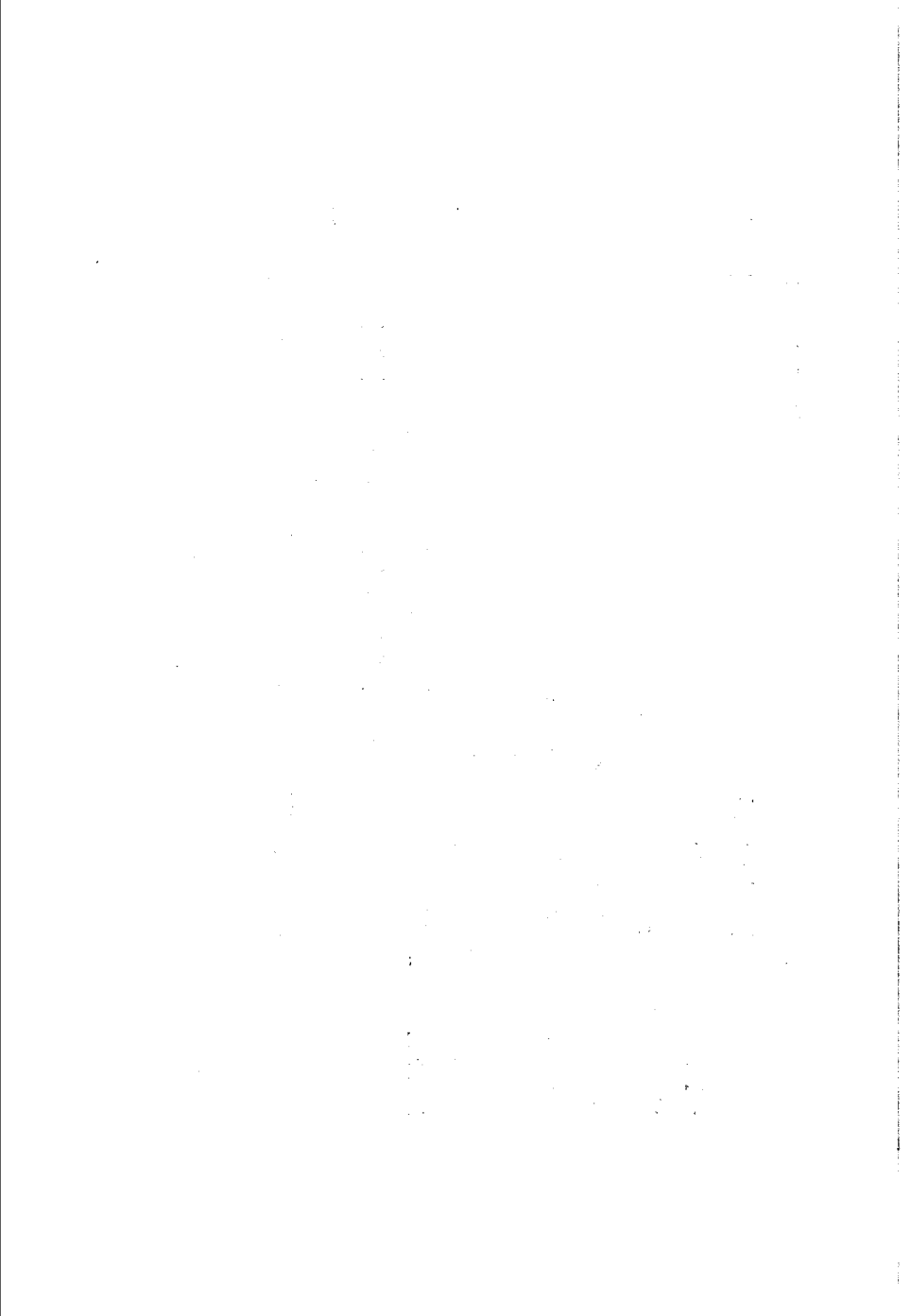
第四、岳軍先生一生精忠報國，他的品行，處人處事謙恭有禮，真可以說是高山仰止，值得我們晚輩效範。

從以上四點看來，岳公總不該再保持沉默了。

時序流轉，抗戰時，許多與我同年的朋輩都只是小孩子，而今相見也不免有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之感。因為在我相識的長輩中，我最敬重岳公，與他傾談如坐春風，我於是大膽地嘗試來為岳公作連續性的訪問，算是拋磚引玉。

不過，我要向讀者感到抱歉的是，這篇稿子是在我返美途中飛機上寫的，飛機搖盪不已，同時手邊又無參考資料，全憑與岳公談話的記憶（當時我並沒有筆記）。重讀一遍，自己覺得這只能算是當時談話的一個輪廓，許多細節一時也想不起來，而且不可避免的會有若干錯誤。這只有留待再回臺北時向岳公道歉，並請補述和改正錯誤了。

陳香梅六十六年三月



談談我的早年

張 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我是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即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出生在四川與雲南交界的一個小縣份。那時我父親在該地做官。我共有兄弟三人，姊妹兩人。八十年前，滇川邊界可以說是文化落後的不毛之地，我小時的教育都是由父親延師到家授館，我也參加過清朝的會考，不過後來因為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在川招考學生，我在成都參加了考試，而且被錄取了。這一件事可以說是決定了我一生的大計，因此與蔣先生相識，同學共事，共同參加革命，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再說童年的事，也可藉此了解當時我家鄉的生活環境，以及醫藥的缺乏情形。

我十歲的那一年，我的祖父去世了。當時家裏請了和尚來唸經。那時是冬天。農村裏用的是泥做的火爐，泥爐中有一個洞，生火的人用一鐵管在洞中上上下下地轉動，藉此控制爐火的大小。我當時童年無知，又好奇心重，看見大人生火，覺得

非常有趣。於是趁着大家離開靈堂休息的時候，偷偷地拿起了鐵管，拼命地往火孔中推轉，那裏曉得爐火已經很旺，再加上我不停地煽動，泥爐忽然爆裂，一塊紅熱的火塊竟跌落在我的腳背上。當時我穿的是縛帶的帆布鞋，火塊粘在腳背上，又痛又急，於是大聲呼救，等到大人來把鞋子襪子脫去時，鞋襪固然差不多已成灰燼，我的一隻腳也幾乎見骨不見肉，一直痛到心坎裏。這件事，如果在醫學昌明的今日，早已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診治，但七八十年前的農村，不但沒有醫生，也沒有現成的藥品，這時只有聽候家人的安排，把一隻腳泡在鹽酸水裏，這更增加痛楚，不過據說可以消毒，防止潰爛。這一場災禍害得我很慘，一連三個多月不能行動；結果總算無醫自愈了。

後來家父宦移成都，我們算是遷居到大都市。在那時，大家都已漸漸感到清廷的腐敗，我是十來歲的男孩，在成都也有機會讀到一些革命性的讀物，心中的革命意識也在此時漸漸生根。我就這個時候考取保定陸軍學校，決定投筆從戎。家父給我六十銀元，作為旅費，赴京參加會試。當時同行的有另一位青年朋友王君，我們兩人性情相投，志同道合。會試時，由段祺瑞親自召見，監考官就是他的部屬，他

叮囑我們在拜見段祺瑞時，一定要行請安禮（即北方旗人的屈膝半跪式見面禮），我認爲這有失我的尊嚴，於是我對監考官說，假如要行這種旗人請安禮，那我就寧願棄考回鄉。我的監護人，也就是我的保證人急得要死說：「這怎麼可以呢？而且你若棄考，那麼連回家的盤費都沒有着落，你還是將就一點吧。」我和同學王君商量，兩人決定來個金蟬脫殼之計，那就是去就考而不做答題，來個交白卷，看他們如何發落。兩人商量妥當後就假裝同意去應試，同來的監護人也就高興萬分。那次考試的課目共分三科，即國文科、數學科和理化科。數學和理化我爲了表示抗議根本一題沒有作答，但國文題目却引起了我的興趣，於是大作文章，自己也認爲非常滿意。本來我想既然我交了兩科白卷，一定不會被錄取，結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金榜有名，而且與其他被錄取的青年，一同得到段祺瑞的召見。這時我又對監護人提出抗議——我拒絕請安。這可難爲了監護人，他們一半勸說，一半威迫我就範，我想當時大家一定認我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叛徒。段大爺駕到後，我們被個別點名去見段氏。輪到我時，我只向前走了幾步，點點頭，左右的人高聲喊「請安，請安！」我當時年青氣盛，馬上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請過安，不知道怎樣做。」他們見

我如此，竟也不再勉強。我想其時當政的旗人已非常擔心漢人的反叛，遇到我這血氣方剛的年青人，與其把我除名，倒不如把我收到軍校訓練一番爲上，這也許是欲擒故縱之計。

我本來爲了反抗代表專制的請安以及與請安相同的各種規定而不願進軍校，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竟順利過了關。我也只好暫時聽候安排，準備到了學校再作道理。到校之後我當然不像其他的旗人學生那麼百般服從，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出了一個國文題目，我認爲可以借題發洩我心中不平之氣，於是又大發牢騷，發揮我的反專制言論。學校的校監對我真是無可奈何。總想找一個機會，把我放逐到什麼地方去，以免在學校生事，而減輕他的責任。

時值清廷正計劃保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學。一天晚上，我已在宿舍就寢，忽然校監來到宿舍把我從睡夢中推醒，他說：「你已考取了留日考試，馬上就要你去日本。」我一時大喜過望，人也醒了，這是光緒三十四年的事。

到日本留學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紀念的一章。因爲我不但在那兒認識了蔣先生，而且遇見了許多後來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

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砲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磨。我們當年都是留髮（帶辮子）出國的。到了日本就把辮子剪掉，這也是從事革命的第一個表示。當年一同在日本留學的，現在已多數不在世了。碩果僅存的人，也都垂垂老矣。

武昌起義，我和蔣先生乃從日本偷渡回上海。我還記得當時蔣先生穿着的是和服，我穿的是民裝。我們的名字已在清廷的黑名單之中，通緝令發表時，日本人到處抓人，可是我和蔣先生已在東京回上海的輪船中。到達上海時，我口袋內僅剩下了一塊銀元。

回國後不久，就參加陳其美（英士）先生領導的上海革命戰役。上海光復後，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先生任都督，黃膺白（鄂）先生任參謀長，我任軍務處軍械科長。

蔣先生同杭州參加革命，浙江光復後，組成新軍一團，開至上海，稱滬軍第五團，蔣先生自任團長。後來擴編爲二十三師，黃先生任師長，蔣先生仍任團長，我任參謀。革命雖然成功了，但那只是曇花一現。二次革命失敗後我又亡命日本。

這時我已在上海結了婚，我的內人馬育英也是革命同志，與我同歲，是江蘇崑

山人。

我第一次去日本，進的是振武學校，三年畢業。畢業後以士官候補生資格，分發到新瀉高田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實習，與蔣先生同隊。

第二次去日本，是在民國二年討袁失敗之後，上海袁氏爪牙大捕國民黨人，我與內人及許多同志一同亡命東渡。這時日本政府恰巧宣布辛亥年在聯隊之士官候補生，可以正式入陸軍士官學校，我乃又入士官繼續學業。內人馬育英則入長崎活水女子學校深造。

我在士官學校畢業後，時在民國四年，國內政治環境愈劣，袁世凱正陰謀恢復帝制活動，不容許我們回國去，日本又提出對華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迫袁氏接受。在日本我們也無法找到適當的工作，我只好應友人之邀，到荷屬印尼爪哇的中華學校去教書去，到民國五年才自南洋返國。

談談我的婚姻

張 羣口述
陳香梅筆記

內人馬育英女士在世時，許多朋友都羨慕我們的美滿姻緣。自民國元年結婚起，迄民國六十三年內人逝世止，我們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而且互愛互敬，這在世界上確是罕有的事。

談到我們的婚姻，就要回溯到民國以前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當時我有一位同學王柏齡，是揚州人。有一年暑假，他要回揚州老家，順便約我到揚州去玩。那時，上海、蘇州、杭州、揚州這些有名的名勝地方我都還沒有去過。但是，揚州的湖光山色我是嚮往已久的。揚州有個瘦西湖與二十四橋，古人詩中有云：「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烟花三月下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些詩句，我早都讀過。所以一提到揚州，就引起了我的興趣。決定和王君同路經上海，前往揚州一遊。

在經過上海時，我順路去拜訪一位姓張的 본家，他從前在四川中學裏教過英文，是我的老師。我知道他在上海，順便去拜謁他。當時他給我介紹了好些他的親友，並且約我和他們一同去教堂做禮拜。在這段時間裏，我結識了一位在教堂任職的朋友丁文駿。

民國元年我再去上海時，又會見了丁先生。他古道熱腸，自動的要替我做媒。因為丁先生在禮拜堂任職，所以時常約我同去做禮拜。我們做禮拜的教堂叫懷恩堂，位於上海北四川路。他給我做媒的對方就是懷恩堂中彈鋼琴的小姐。

那位彈琴的小姐就是我不以後的太太馬育英女士，她是江蘇崑山縣人，生於民國前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她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岳父譚霞城，我的岳母是他同邑的彭金鳳女士。馬家家境原本小康，不幸，育英七歲那年，霞城公棄世，接着他的兩弟一妹也後夭折，遺下育英母女二人，相依爲命。後來，岳母去上海，入聖經學校，卒業後任傳教工作，往來於上海崑山間。育英以受母教爲多。十一歲時，因得浸信會吉慧麗、柏樂提兩教士之助，得入上海浸信會主辦之晏摩氏女子中學就讀。十三歲受洗歸主。十九歲畢業後，就應揚州慕究理女子

中學之聘去教書。三年後返滬，再回母校晏摩氏女校任教。千里姻緣一線牽，我因丁先生介紹，得識育英。

經丁先生介紹後，我們時常見面，但都是有往無來。因為當時晏摩氏女中校規極嚴，她不能出來，祇能由我去看她，所以我們的來往是往而不來的。她的老師是外國人，相當守舊。每當我去看她時，那位外國老師就拿一本書坐在我倆的旁邊，等於是在監視我們。我們也曾在媒人丁先生家同席吃過幾次飯，時間都是禮拜天。雙方表面雖很矜持，但彼此却是心心相印的。那時青年男女要看一場電影、吃吃館子是絕不可能的事。就是那位善意監視我們的外國老師，一直等到我們結婚的前一天，才離開我們，允許我們自由。

民國元年四月我與育英訂婚。原擬於六月間結婚，但不幸我突患了傷寒，病得很重。當時我任軍職，身體原來很好，不料有一次騎馬遇雨，受了涼，就染上傷寒。我與育英雖然已經訂過婚，但是格於教會學校規定，當我住院時，育英仍舊不能前來醫院探視。爲了這場病，婚期不得不延擱下來。

我們的婚禮遲至民國元年十月五日才舉行。我與育英雖然都是基督徒，但所屬